

變亂與革命技術

史大林

~~托羅茨基~~

~~莫索里尼~~

~~希脫拉~~

~~匹爾蘇茨奇~~

~~里娃拉~~

馬刺帕爾脫著

變亂與革命技術

古有成譯

序言

著者的計畫雖在闡明奪取和防護近代國家的方法，這個方法，多少是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所論述過的題目，本書決不是馬氏名著『君王』（The Prince）的一個模倣——連近代式的模倣也不是，這樣模倣出來的東西，定要和馬氏隔得很遠。在馬氏所藉以演繹其論辯，取得其例證和思考事件的時代當中，公私的自由，市民的尊嚴，和人們的自尊，都已降到這麼低的田地，我如果把馬氏名著中的任何教訓，應用到現代歐洲急待解決的問題上來，恐怕要開罪於讀者吧。

一眼看去，過去十年間的全部政治史，也許似乎是凡爾賽和約的運用，大戰的經濟結果，各國政府企圖確保歐洲和平，這一類的故事。然而，其真正的解釋却不是這樣，其真正解釋，應找之於自由，民主和議會政治的擁護者，及其反對者的互相奮鬥中。各種政黨的態度，便是這種奮鬥的政治形態。爲了解近年來許多大事，預測歐

洲各國政治的前途起見，必須從這個觀點，及僅只從這個觀點，來把各政黨行為考察。差不多在個個國家內都一樣，一方面有在野黨，擁護議會政府，應用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方法來保持國內權力的平衡。這樣的政黨，我把種種的保守派，由右翼的自由黨，以至左翼的社會黨，都算在內。別方面有對於國家抱一種革命觀點的黨，極左和極右的黨，法西斯黨和共產黨，近代的叛變的黨。極右黨注意於秩序的保持。他們指摘軟弱，無能，不負責任的政府。他們宣言必需一個強健組織的國家，對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等生活作嚴厲的控制。他們是國家的崇拜者，專制國家的擁護者。他們看到，在一個國家內只有反對共產主義危險，才可保障秩序和自由，這樣的國家必須從中心點取得控制權，必須是有威權的，反自由的，反民主的。莫索里尼的信條是，『萬物歸於國家，無物可外國家，無物可反國家。』極左黨宗旨在奪取國家以實施工農迪克推多制。『有自由便無國家』是列寧的信條。

莫索里尼和列寧，在極右極左兩黨的叛變者和自由及民主國家的防禦者之間的鬥爭發展上，是極佔重要的例子。

自然，法西斯黨的策畧是一種，共產黨的策畧又是一種。然而，國家的奪取者和防護者，似乎都還沒有認識那些策畧是什麼，或把牠們解釋，使人明白其異同之點，假如有任何異同之點的話。貝拉孔(Bela Kun)的策畧，完全和俄國布爾塞維克的不同。卡普(Kapp)，里哇拉(Primo de Rivera)，匹爾蘇茨基，似乎所計畫的企圖，原則上完全不同於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策畧。也許貝拉孔所表現的是最近代的策畧，他在國家的爭奪上比其他三個更是專精，是一個更危險的人物。

然而他在着手奪取國家之時，也證明其不僅完全不懂叛變的近代策畧，兼且不明瞭奪取國家的近代方法。

貝拉孔以爲自己是模倣托羅茨基。他並沒注意到，他所行的只是馬克思依巴黎公社結果而定下的原則。卡普打算依拿破崙『二月十八』(eighteenth Brumaire)的路線，把威瑪爾的國會結果。里哇拉和匹爾蘇茨基，以爲克服近代國家，只要表現一下暴力，把立憲政府廢棄便夠。

這麼多是明白的了：不論政府，或叛變者都不曾認真研究過，究竟有沒有革命的一種近代科學，或革命的一般原則是什麼。一方面叛變者追求其革命策畧，政府却繼續採用防禦的警察手段來反對他們，這樣表示他們對於進攻和防守近代國家的基本原則，都絕無所知。這樣的蒙昧是危險的，著者乃立意援引親眼看見過，多少親自參與過的事變，來表明始於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迄今歐洲境內還沒有完結的革命時代的大事。

目錄

序言		一一四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托羅茨基的策略		一一四二
第二章 托羅茨基對史大林革命的失敗		四三—七四
第三章 一九二〇年波蘭的經驗：華沙秩序良好		七五—一〇二
第四章 卡普或戰神與馬克思		一〇三—一一四
第五章 拿破崙——或第一個近代的革命		一一五—一三四
第六章 里哇拉及匹爾蘇茨奇，一個朝臣和一個社會主義將軍		一三五—一四六
第七章 莫索里尼		一四七—一九〇
第八章 一個冒牌的迪克推多——希脫拉		一九一—二一〇
尾聲		二一一—二一六

第一章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托羅茨基的策略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的戰畧 (strategy)，肇始於列寧，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策畧家 (tactician) 却是托羅茨基。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俄國時候，我有機會和各界的許多人士，談及托羅茨基對於十月革命的貢獻。關於這層，有官方的理論，這是史大林所主張。可是無論什麼地方，尤其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托羅茨基派比旁的處所更強的地方，我聽見過人們對於托羅茨基的判斷，和史大林所發表的完全不同。我問而不答的，只有盧那車爾斯基 (Lunacharsky)，給我以史大林理論的客觀辯明的，只有卡美尼夫太太 (Madame Kamenev)，這是不足為異的，卡美尼夫太太原是托羅茨基的姊妹。

一關於史大林列寧對於『永久革命』，及其對於托羅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貢獻，這兩個題目的爭論，我們此處不能詳細探討。史大林否認十月革命爲托羅茨基所組織；史氏歸十月革命之功於五人組織的委員會，此五人便是斯味德羅夫（Sverdlov），史大林，保布羅夫（Bobrov），奧麗茨基（Oritzki），和達進斯基（Dzerjinski）。這個委員會，列寧和托羅茨基都不在內，是以托羅茨基爲主席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一個主要部分。但是史大林和主張『永久革命』說者的爭論，總改不了十月革命的歷史，這個革命，依列寧所說，是托羅茨基所組織指揮的。列寧是十月革命的『軍官』（Strategus），理想家，感興者，危難之際不期而來的救護者，可是創造布爾塞維克革命的技術的人，還是托羅茨基。一

近代歐洲政府所要提防的共產黨的危險，不在於列寧的戰略，而在於托羅茨基的策畧。離開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一般景況，不易設想出列寧的戰畧。反之，托羅茨基的策畧，是離却國家一般情況而獨立的；其實際應用，無需依靠爲列寧戰畧所必不可缺

的景況的任一件。共產革命常可發生於歐洲任何國家的緣故，就在於托羅茨基策畧的運用。換句話說，列寧的戰術不能用於任何西歐的國家，除非那個地方準備得好，情況完全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一樣。列寧在所著『共產主義的幼稚病』一書上，自己注意到，一九一七年俄國政治情況的奇特，『在於四個特殊的情況，這四個情況，現在在西歐決然得不到，將來也無疑決不會朝同一或類似的路線展開』。這四個情況在此地無關，不必解釋。誰都知道組成一九一七年俄國政治狀況的奇特的是什麼。是以列寧的戰略，對於歐洲各國政府，並無馬上的危險。現在而且常常給予牠們以恫嚇的，還是由於托羅茨基的策畧。

史大林批評『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策畧』一書寫道，無論誰願把一九二三年秋德國所發生的事變評價的，切勿忘記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特殊情況。他加上說：『這個特殊情況，托羅茨基同志應該記起，因為他發見十月革命和德國革命之間，有一完全類似，而責難德國共產黨所患之真正的或假想的大錯。』於史大林看來，一九二三年

秋德國革命企圖的失敗，由於實施列寧戰畧所必需的特殊情況的缺乏。他發見托羅茨基責備德國共黨，而覺着詫異。可是由托羅茨基看來，革命企圖成功，並不依靠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相類的情況。一九二三年秋德國革命失敗的理由，並非因為那時不能把列寧的戰畧實施。德國共黨方面無可饒恕的錯誤，在於他們忽視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策畧。順利情況的缺乏，和國家的一般狀況，決不影響托羅茨基策畧的實施。事實上，德共黨之不能達到目的，確沒有充分理由可為辯護。

列寧死後，托羅茨基的偉大的異說，給予了列寧主義的統一性以威脅。托羅茨基是一個處境不利的改造家。他現在是流放中的一個路德（Luther），他的黨徒，不是幽葬而改悔太遲的，都連忙公式的改悔，改悔得太快了。然而，我在俄仍常可遇持異說者，他們並沒有失掉批評的嗜好；還要從史大林的論辯中抽出最出人意料의 結論。史氏的論辯的結論說：沒有克倫斯基，不能有列寧，因為克倫斯基造成一九一七年俄國特殊情況主要原素之一。但是托羅茨基却不承認克倫斯基有什麼需要；不需要克

倫斯基，就不需要史脫列斯曼(Stissermann)，傍卡累(Poincare)，魯意佐治(Lloyd George)，佐力第(Giolitti)，或麥克唐納一樣。他們的存在，和克倫斯基的存在一樣，對於托羅茨基策畧的實施，並沒有利或不利的影響。讓傍卡累處於克倫斯基的地位，一九一七年的布爾塞維克革命，將見其一樣成功。在莫斯科，和在列寧格勒一樣，我有時會碰見過擁護『永久革命』的異說的人們，他們真的主張說，托羅茨基沒有列寧也幹得來，托羅茨基沒有列寧也能存在，這無異說，托羅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也許當了權，假如列寧曾是居留瑞士，完全不參加俄國革命的話。

上句斷語，是冒險的斷語，可是只有太過誇張戰畧在革命上的重要的人們，才會認為武斷。頂重要的是變亂的策畧，革命的技術。在共產革命上，列寧的戰畧，並不是使用變亂策畧上一個必需的準備。戰畧本身，並不能達於奪取政權之路。在意大利，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內，列寧的戰畧已被完全應用了，那時的意大利，也確是所

有歐洲國家中最成熟而適於共產革命的一個。事事都準備着革命的到來。但是意大利共產黨相信：意國的革命狀況，無產階級大眾的作亂熱情，總罷工的流行，經濟及政治生活的痿痺狀況，工人強佔工廠，農民強佔土地，軍隊，警察，和文官的瓦解，判事的軟弱，中產階級的屈服，和政府的無能，是容許政權移於工人身上的充分條件。國會受制於左翼政黨，實際上做了工會革命活動的後盾。奪取政權的決心，並不缺乏，所缺的只是革命策略的知識。革命漸漸消磨於戰畧中。這個戰畧便是作一個決定的攻擊的預備，可是沒人知道怎樣去領導這個攻擊。君主政體（這個當時常被稱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君主政體）被實際談論為對於革命攻擊的一個嚴重障礙。國會內佔大多數的左黨，極其關心於工會的活動，這就是使國會不能不害怕牠本身範圍外將有新權力崛起，或且向牠進攻的理由。工會懷疑國會，或將努力把無產階級革命變為內閣的改變，以謀下中階級的利益。這個革命怎能組織起來呢？這就是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間的問題；不僅在意大利如此，幾乎西歐所有國家都是如此。托羅茨基說，共產

黨並不知道怎樣去利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訓，這並非指革命戰略的教訓，却是指叛變策畧的教訓。

托羅茨基的這個說話，非常重要，要記住牠，才能了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用的策略，即是，共產黨革命的技術。

我們可以說，變亂的策畧，是革命戰畧的一部，是革命戰畧的宗旨和目標。托羅茨基關於這點觀念，是很明顯的。我們已經知道，他認到變亂策畧爲無關國家一般狀況，無關適於叛變的革命形勢的東西。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策略的實施上，克倫斯基的俄國，並不比荷蘭和瑞士，發生更多的問題。列寧在『共產主義的幼稚病』上所解釋的四個特殊情況（這便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束，兩者有合併的可能；有從兩組國家的戰爭，取得短時期的利益的機會，這兩組國家如不是正在戰爭，也許已聯合一致來撲滅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由於俄國領土的遼廓，及其交通方法的可憐，能把內戰支持到相當長的時間；農民大眾中，有民主的中產階級革命運動的

存在），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形勢的特徵，可是牠們對於共產革命的成功結果，並非必需。假如布爾塞維克策略，要靠列寧戰畧所依靠的同樣情況，才能實施，那麼，在現在所有歐洲國家內，是決不會有共產黨的危險了。

列寧在他的戰畧觀念上，決有一種真實意味，兼缺乏準確和比例。他論及戰略時，脫不了克勞則維次（Clausewitz註一）的思想，認戰略為哲學，比認戰略為一個藝術或科學的多。在他死後，他床畔的書籍中，找得了一本克勞則維次的『關於戰爭』，他曾親筆加以註釋；又從他對馬克思『法蘭西的內戰』一書的邊註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托羅茨基對於他的政敵戰略天才的挑戰，是多麼的有憑有據。蘇俄官方對於列寧的革命戰畧如此重視，理由何在，我們很難明白，唯一理由大概是立意要藉以形容托羅茨基的渺小吧。列寧在十月革命上所担歷史任務，實足使我們無需認他為一個偉大的戰畧家。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充滿希望而不能耐。托羅茨基當選為彼得格勒（Petro-

布爾塞維克的主席，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及獲得了莫斯科蘇維埃的大半數，最後使列寧對於蘇維埃的大多數問題的焦慮，安靜下來了，關於這個問題，他從七月起就念念不忘。然而，他還一樣憂慮着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個大會十月尾就開。『我們無需獲得大多數，』托羅茨基說，『不是大多數，才可奪得政權。』托羅茨基的說話並沒有錯。『等候確定的大多數，』列寧同意說，『簡直是稚氣。』他寧可鼓動大眾起來反對克倫斯基政府；他要把俄羅斯隱沒於無產階級之下；他要給俄國全民以叛變的信號：他要參加蘇維埃大會，把孟塞維克少數派的两个領袖達斯（Das）及史科柏羅夫（Skoblov）壓倒；他要宣布克倫斯基政府的沒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降臨。叛變的策略並沒有跑進他的心中，他只想及革命的戰畧。『不錯，』托羅茨基說：『可是第一，你必須佔據城市，奪得戰畧的地點，推翻政府。爲做到這層起見，一種叛變必須組織起來，暴動隊伍必須加以訓練。只要少數的人；大眾無所用之；一個小隊伍便夠了。』

可是：由列寧看來，布爾塞維克革命，決不要指摘爲是一種役機。他說過「革命決不要靠一個陰謀，或一個黨，要靠社會的進步的部分，」這是第一點。革命必須由全民的革命衝動支持，這是第二點。革命必須在革命潮高漲時爆發，這是第三點。這三點爲馬克思主義和光是役機的差別。

「很好，」托羅茨基說，「可是全民太過笨重，實不適於革命。只要有一個小隊伍，冷靜而強烈，受過革命策畧的充分訓練，便夠。」

列寧認可了：「我們必須把所有我們的個體拋入工廠和兵營中。他們在那兒必須站穩，因爲那兒是決定的地點，革命的錨；就是在那兒，我們必須用如火如荼的熱誠的言詞，解釋宣布我們的計畫，并向他們，挑動說：完全接受這個計畫，否則革命去！」

「好極，」托羅茨基說，「可是我們的計畫被大眾接受以後，革命還須加以組織。我們必須招致工廠兵營中的可靠而勇猛的黨徒。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衆多的工人